

弘一法师像



留学日本时的李叔同



扮演茶花女的李叔同



李叔同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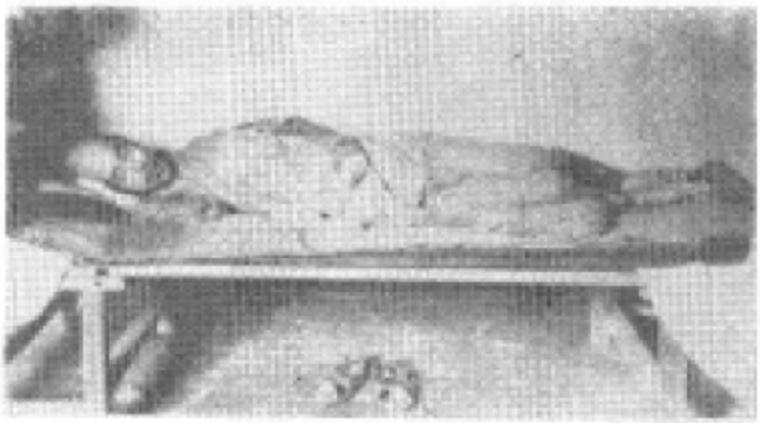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弘一法师书法



画友本的同叔李



弘一法师在泉州圖寂

——以上照片均为丰一吟供稿

目　录

追念我的父亲邵荃麟同志 ……邵小琴（ 1 ）
忆事怀人话浙江 ……严北溟（ 38 ）
从旧营垒到永生的路 ……沈国英（ 51 ）

革命武术家陈文征 ……顾启欧　窦以銮（ 66 ）
武术春秋 ……金　鼎（ 82 ）
回忆抗战前浙江的武术运动 ……陈天申（ 89 ）

“八·一四空战”的回忆 ……唐中和（ 94 ）

我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 ……李鸿梁（ 98 ）
一代高僧弘一法师 ……沈本千（ 118 ）
艺术大师李叔同 ……钦　文（ 124 ）

李叔同披剃前夕的手笔 ……姜书凯（ 129 ）

杭州旗营与八旗子弟生活 ……张廷栋（ 133 ）
我所知道的绍兴师爷 ……朱仲华（ 148 ）
绍兴师爷的兴衰 ……陈觉民（ 153 ）
绍兴锡箔 ……金汤侯（ 160 ）

国民党统治时期浙江省的历任县长名单补正 …（ 179 ）

追念我的父亲邵荃麟同志

邵 小 琴

一、青少年时代

我的父亲邵荃麟同志，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出生在四川山城重庆，但他的故乡是浙江慈溪东乡邵村。在他出生后四年，即随祖父回到了家乡。祖父是个有钱的药材商人，在家里请了一位私塾老师，教我父亲读四书五经。父亲对于“之乎者也”的古文感到枯燥无味。我们小时候，爸爸就曾表演那位老师的怪模样给我们看，他脑后留着辫子，手里握着戒尺，闭着眼睛，一面摇头晃脑，一面发着刻板的抑扬顿挫的读书声。这种读书方式爸爸是很反感的。他童年时代很喜欢看小说，常背着爷爷去读《水浒传》、《红楼梦》之类的“闲书”、“禁书”。辛亥革命后，乡下也办起洋学堂，父亲就在乡村学堂受完了小学教育。小学毕业那一年，爆发了“五四”运动，在少年时代的父亲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年暑假，他离开了家乡去上海读书，考进了复旦大学附中，从此他开始接触了“五四”新文化革命运动。他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在这革命大浪潮中思想非常活跃，贪婪地阅读着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品。他曾这样回忆过：“那时印象现在还有点记得，尤其《别母已三年》的一首歌词，非常为我所爱好，那时正在‘五四’之后，个性解放和反抗中庸主义精神，在青年中间广泛流传，所以象聂政、聂嫈那样强烈、鲜明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性格，便自然为青年们所热烈欢迎，而这类性格的创造，对于当时的青年的精神生活，确实起了很大的鼓励和提高作用。”五四运动冲击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唤醒了沉睡中的中华民族。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古老的中华民族该如何才能振兴？这一问题时时在折磨着每一个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中学时代的父亲有五六个非常接近的朋友，经常在一起谈论，其中有一个叫费巩的，当时他渴望写出一部治国的好宪法。父亲和他经常有热烈的争论。有一次爷爷请他们几个去面馆吃面，在饭桌上大家又沉浸在热烈的争论之中，以至爷爷问他们想吃什么面时，父亲心不在焉地答了一句“随便”，于是爷爷高声对堂倌喊道：“来五碗随便面！”引起哄堂大笑。后来费巩终于出国去学法律了。不过，回国后严酷的中国社会现实一再打破他的幻想，最后他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在重庆因揭露、痛骂国民党，被特务暗害了，解放后被追认为烈士。我父亲与老同学、著名动物学家陈世骧相遇时，还十分怀念费巩，对陈说：“费巩实在是个很好的人。”

中学时代的父亲兴趣是很广泛的，但更多的兴趣是集中在政治问题和文学方面，在上海使他有机会读到更多的书，以至被祖父发现，特地来信训斥了他。至于数学，他是马马虎虎的，他说他只会“土演法”。他爱好美术，不仅爱欣赏（我家还保存着他收集的世界名画全集），而且还常常作画，甚至许多笔记本里、书里，都留下他的插图。不过，画得并不高明。熟悉我父亲的人都知道他是有名的病号，骨瘦如柴，谁能想到中学时代的他，尽管技术并不算好，还是个小足球队队员呢！他也曾参加过马拉松赛跑。

二、踏上革命征程

一九二五年我父亲中学毕业了，思想也逐渐成熟了，他进了

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读书，但这非爷爷所望。他之所以有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他想探索中国经济富强之道，在没有接触到共产主义教育之前，父亲确实是很苦恼的，他曾大量的阅读各种书籍，希望从中找到答案。后来他找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便爱不释手，一位和我父亲同宿舍的文学系同学回忆说："那时，他整天抱着本《资本论》。"确实，他看来看去，发现还是马克思讲得有道理。他开始有选择地读了一些关于苏联十月革命的书。他的行动引起了地下党的注意，组织上派人接近他，并主动借些小册子给他，也就在这时，一九二五年大革命开始了，父亲便卷入到五卅运动的热潮中间，接触了上海的工人群众。一次，他参加到游行示威的行列中，很快，示威的队伍被孙传芳的军警包围了，前面是机关枪，后面是马队，示威的队伍中有些人多少有点犹豫了。这时队伍里忽然有人唱起了《打倒列强》，一唱百和，群众的感情，立即被激发起来，坚决而勇猛地向机关枪冲过去。当时我父亲和许多人都是被激动得流泪的（直到二十多年后，他还把这幕可歌可泣的场面用文字记录下来）。后来，孙传芳的军警慌乱了，刽子手开始了血腥的屠杀，机枪、马队和水龙冲散了示威的队伍，父亲在混乱的人群中也挨了反动军警的几鞭子。那是裹着橡皮的钢鞭！就在这残酷的镇压面前，父亲严肃地挑选了自己一生的道路。正如他曾说过的，"这几鞭子把我敲得更清醒了，中国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走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以后他曾把自己的名字邵骏运改为邵亦民。"骏运"是封建家庭对他前途的一种期望，"亦民"加一横是"赤民"，这标志着他背叛出身的剥削阶级，要成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决心。后来写文章也曾用过邵逸民这一笔名。

就在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六年三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复旦大学团小组长，不久，做了江湾区团部委书记。他一面读书，一面从事着党的地下工作。由

于工作需要，他从学校里搬了出来，单独住在江湾区一间漂亮的洋房里，还有个“门房”，其实这正是地下党机关所在地。一次，两个老同学象往常一样来看他，不料一进门就被北洋军阀的宪兵捉住，他们才看到我父房间里早已被抄得乱七八糟；经过长时间交涉，校长出面作保才放了这两个同学。我父亲则因事前得到组织上的通知，早已转移了。不久，学校反动当局便将我父亲开除了。正当他准备以全部精力、时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家庭的阻挠开始了。爷爷听说儿子被开除，决心要他离开上海，去日本留学。爷爷率许多亲友给他送行，十分热闹。其实爷爷哪里知道自己的儿子早已属于祖国和人民了，再不是一个当父亲的所能摆布的人了。当轮船敲响第三遍锣的时候，父亲戴上帽子，提起小箱子，低着头，混在送客的人群中也一起下了船。之后，托人在青岛发来一封家信，佯称“一路平安”。爷爷满心欢喜，哪里晓得过了不久，一个店铺伙计匆匆跑进来说在街上见到了大少爷，爷爷十分着急，派人四处寻找。这时我父亲已经被派往杭州担任团地委组织部长，成为一名地下工作的专职干部，连他最要好的同学、朋友都无法弄清他的踪迹。爷爷、叔叔又怎能找得到他呢？

三、严峻的考验

结束了宁静的书斋生活，开始了动荡的亭子间生活，父亲回忆上海那段生活时，颇有兴味地说：“那时我们常常跑到俄国餐厅里，要一碗最便宜的汤，在那里吃黑面包是不要钱的。”还有一次，因为睡地铺，爸爸的耳朵被老鼠咬破了。艰苦生活的磨炼对于革命者来说仅仅是第一关。反动派的迫害、囚禁、枪杀还随时威胁着每一个革命者。有一次，他走近一条巷子去找一个同志联系工作，临近那房子时才发现情况不对，低矮的围墙头上已经

露出了北洋军阀大兵的枪刺，偏偏这又是一条僻静的死弄堂，一个人也没有，急中生智他便一头钻进旁边一家小裁缝店，凑巧裁缝师傅又错把他当做前来取衣服的顾客，拿出做好的衣服左比右比，父亲也只好将错就错，推说衣服不大合适，改日来取。说罢，压低帽沿，走出店铺。类似这种化险为夷的事情是经常遇到的。

北伐战争时期，上海工人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三次武装暴动。我父亲参加了暴动，和工人同志一起打过街垒战。后来蒋介石背信弃义，发动了反革命的“四·一二”大屠杀，致使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事实上，浙江杭州地区的反革命事变开始得更早一些，地下党的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事变后三四个星期，我父亲便重新被委派为江浙区委委员。这时江苏、浙江两省合在一起成立一个区委，机关设在上海。此外，他还先后兼任了上海杨树浦区和法租界团区委书记。斗争更加艰巨了，生活条件也更加恶劣了，渐渐地结核病菌侵袭了他的肺部。开始他并未觉察，革命的热情支持着他，一直忘我地工作。一九二八年根据中央指示，浙江省和江苏省分为两个机构，我父亲又先后担任了江苏省团委常委、浙江省团委书记、浙江省党委常委。也就在这一年的五月份，在上海召开的浙江省省委扩大会议上，他认识了周恩来同志。从这时起，他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都受到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教诲。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央在莫斯科召开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当时浙江省推选两名代表，我父亲是其中一名，后因肺病发作未能出席。这时组织上又将我父亲调回上海到团中央工作。他住在狄思威路吉祥里的一个亭子间里。

一九二九年底，他的病愈来愈重了。一次他在向工人们讲演时，突然吐起血来，而他若无其事，跑到水龙头边漱漱口，又继续讲下去了。当夜他躺下后，一阵剧烈的咳嗽之后，血竟然涌上

喉头，从口喷出，一直喷到蚊帐上。当他被送往医院时，肺部已有严重空洞。几乎跑遍上海，没有一家医院肯收留他了，唯有霞飞路上一家德国人开办的私人医院肯收。但住院费十分昂贵，经组织研究，决定派人去通知我爷爷，以便支付这笔医疗费用。我爷爷除宁波药店外在上海还开钱庄，在汉口中山路还有一片房产。爷爷一得到他儿子的消息，头戴着一顶红顶瓜皮帽，身穿着长衫，匆匆奔到医院去，经过抢救，我父亲居然从死亡边缘又挣扎过来了。组织上因他严重的肺病，批准他离职养病。最初被接回宁波家中，在家住了一些时候，便转入了杭州西湖医院。

一九三三年底我父亲的健康已基本恢复，他住在上海宁波同乡会，写了一封长信向上海临时党中央请求恢复工作。一九三四年一月，组织上就派他担任了党的一个外围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以下简称“上反”）宣传部长，工作比较轻。与此同时，他主办的出版社西门书店也开张了，他便分出一部分精力组织稿子出书。四月的一天傍晚，“上反”组织部长（这时已叛变）突然闯进书店，问父亲要叶以群（“上反”负责人，也是地下党委派的）的地址；我父亲看来人样子不对，便回答他“不在上海”。说完，父亲便迈腿走出书店，想到马路上甩掉他。但这个叛徒身体比父亲强壮的多，一路紧盯不放，快进租界时，叛徒拿出特务用的证件叫警察把父亲抓住了，先送到警察分驻所。途中，我父亲乘敌人不备，偷偷毁掉了身边一封由西门书店转叶以群的信。到了警察分驻所，敌人用黑布把他眼睛蒙上，用汽车把他绑架走了。父亲只感到汽车走了很多路，后来才知道他被送进了市警察局看守所。他被关押后不久，便买通了一个看守的警察，送一张条子给我叔叔，答应条子送到给那警察五块钱。这样家里就开始营救他了。爷爷通过几个大商人的关系，用两千块大洋买通了市警察局长文鸿恩，最后才保出狱，前后关押不过一个多月（“文化大革命”中，就因为我父亲讲了二千块大洋，而叔

叔记得用了三千块大洋，就长期不给他作结论，直至死后，“中央专案组”的人还跑到宁波对我叔叔逼供信，还动手打了他）。在关押期间，父亲经过几次提审，比较重的有两次，其中有一次是叛徒曹和主审，父亲和曹是认识的，曹也曾担任过团法租界区委书记。他们在一起开过会，曹逼他自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面对这无耻的败类，父亲气愤极了，用手打了他一个巴掌，严词拒绝。敌人开始打我父亲，见他不屈服；又来软的，递给他烟茶，仍然无效；又继续敲打，父亲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开始他是和四个人囚禁在一起的，后来把他单独关起来，他从看守那儿知道自己很快要被解往南京雨花台了。当他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对他自己的选择义无反顾，充满了一种必胜的信心，到这个时候他感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平静。这就是后来父亲向我们解释什么叫“视死如归”一词时所说过的一些话。十年浩劫中，“四人帮”一直用父亲曾被捕的问题来折磨他，以至在人死后的一九七五年的“突击定案”时，急速给他戴上“叛徒”的帽子。想到这些，实在是令人愤慨！

四、早年的文学生活

还是在养病期间，我父亲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名著，对于文学的爱好日益加深，鲁迅和高尔基是他最崇敬的两位文学家。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他在上海内山书店第一次拜会了鲁迅先生。那次本是鲁迅先生约我母亲葛琴同志去谈话，答应为她的短篇小说集《总退却》写序。我母亲把这次约会告诉我父亲。他俩早在一九二八年江苏省团委工作时就认识了的。这次因为我母亲知道他在养病期间，从家里弄到了一笔钱，想办个出版社，希望得到鲁迅先生的支持，所以来约他同去见鲁迅。后来一道去的还有周扬、卫猛克。到后，鲁迅先生与我母亲谈了写序的事情，然后便请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家到附近一家ＡＢＣ咖啡馆去喝咖啡，和大家谈了不少。在离开咖啡馆前，我父亲将打算办一家出版社的事告诉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当场表示支持。在这前后，他曾几次给鲁迅先生写过信，《鲁迅日记》中记有："得邵亦民信"、"得邵逸民信"。

一九三四年他被保释出狱后，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几经周折未能接上关系。这时他一面找党，一面拿起笔进行战斗，他完成了和以群合译的高尔基文艺书信集《怎样写作》。三六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糖》、速写《车站前》等。其实他最早发表小说是在一九二七年刊登在一个共青团杂志上的，不过那时他与文学生活并没有多大关系，之后他在上海参加了左联，在那一场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之中，他写了一篇题为《对于运用文学上统一战线应有的认识》的文章，以我党在大革命中用鲜血换取的教训，用国际上反法西斯斗争中所累积的宝贵经验，去谈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中国文学界所面临的统一战线问题。文章末尾提出了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包办主义等口号，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一九三七年春，鲁迅先生已经去世，整个文艺界也显得比较消沉，上海物价又飞涨，许多作家生活感到困难。叶以群和张天翼提议到我母亲家乡——宜兴丁山去写作。于是陆续有七八个人——有叶以群、张天翼、王惕之、朱凡、梁文若、刘白羽和我父亲去到丁山。后来吴组湘、蒋牧良也去了。吴组湘是应我父亲的邀请去的，目的是要吴组湘设法通过冯玉祥的关系营救几个被国民党抓起来的人，其中有楼适夷、华岗。在丁山这僻静山乡，大家过起了集体生活，由我姨婆做饭。每天上午各自写作，下午读书报，晚上讨论新出现的作品和各自的初稿以及准备创作的题材。这种讨论是非常民主、非常友善的，充满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还有两天组织大家谈了各自的出身经历、文艺创作思想。虽然没有党的组织在领导，但大家都感到彷彿在过着党的小组生

活，这些经历对每个人的思想改造和创作都是十分有益的。当时丁山国民党特务对他们的行动十分注意，曾多次爬在屋上窃听。有一次他们摆脱了这群狗一道划船到太湖中心，在一望无际、广阔无边的水面上同声高唱《国际歌》，那情景是十分激动人的。丁山的聚会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报上曾有一条消息“左翼作家云集丁山”。于是在“七七”事变前，大家便陆续离开了丁山。这时我父亲暂时到了杭州俞仲武的《儿童时报》编辑部工作。

五、在浙江

一九三七年八、九月间，我父亲和我母亲相约到杭州见面，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找关系，之后又回杭州。十月，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派朱镜我、张三扬二同志到杭州联系失去关系的人，找到我父亲，经过谈话，最后恢复了组织关系，同时恢复关系的有六人。这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组织上决定派我父亲和其他两位同志去开辟浙南抗日救亡运动。开始他参加了浙江流动剧团，这是党领导的一支宣传队伍（团长刘保罗，后在大别山新四军时牺牲），这支宣传队伍走过上千里路，演过上百场戏，在浙江广阔的农村里撒下了抗日救亡的火种。通过这支小小的革命队伍向敌后根据地输送了许多优秀青年。我父亲不会演戏，除了办刊物，做组织工作之外，他也力所能及的做了许多演戏的工作，搬运道具、装拆幕布、演可以不说话的“跑龙套”角色。在田汉写的《芦沟桥》中他扮演了一个士兵，不顾自己身体虚弱，扛着沉重的枪，上下奔跑，一丝不苟。一九三八年，组织上决定我父亲和张三扬同志一道率领一支“战时抗日政治工作队”前往龙泉县，龙泉县县长是唐巽泽，他是黄绍竑新委派去的。那时黄是浙江省政府主席，他委派了唐巽泽等几个县长去浙南开辟抗日救亡工作。唐在金华找到张三扬和我父亲，要求流动剧团分一部分人去

龙泉县政府工作。经向上级党组织请示后，便组织了这样一支由十多个党员组成的队伍开进龙泉县，他们的支部直属于中共浙南特委领导。张三扬任县政府的政工室主任，我父亲任教育科长。而国民党龙泉县县党部几个人都是严密控制在C.C.特务手中，是顽固派。因此当时工作是十分复杂的，斗争是十分尖锐的。几次斗争如欢送子弟兵去新四军根据地、县政府召开规模较大的农民代表大会，选举县代表等，都以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当时他们广泛地发动和依靠了龙泉的广大群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成立了各种组织："青年救亡工作团"、"农民救国会"等。与此同时，为适应形势要求，秘密扩大了地下党组织，发展了一大批新党员。这个时期我父亲还经常在民众教育馆和青年补习学校发表抗日宣传讲演，向青年系统讲授了《抗日救亡十大纲领》。至今，龙泉城镇和乡间的旧建筑物的墙壁上，仍留着当年政工队员们绘制、书写的抗日漫画和标语。台儿庄大捷时，在党的领导下，万人的龙泉县举行了一次火炬大游行，口号声此伏彼起，我父亲高擎着一支点燃的火把，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繁忙的工作使他的肺病又复发，经常发烧吐血，但一工作起来，他把一切置之度外，精神抖擞。人家说他马不停蹄，他说："我们是马，我们背负着民族解放的重任，不能停蹄啊！"他经常在昏暗的油灯下通宵达旦地写作。《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等时事政论文章就在这儿写成的。

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省委领导决定派我父亲去金华参加省文化小组的工作。当时文化小组三人，组长是骆耕漠同志，这时他和骆耕漠同志主编了大型的综合性半月刊《东南战线》，编辑有徐进、毛玲、杭华、杜麦青和我母亲等，由金华生活书店发行。这个刊物出了六期，由于刊物比较红，国民党下令停刊。同时还领导了《浙江潮》、《东南文艺》、《青年团结》、《东南儿童》、《刀与笔》、《新女性》以及三九年下半年创刊的《浙江妇女》

等刊物。此外还办了好几个进步书店，当时还派了一些同志打入了国民党的报刊，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这些报刊。黄绍竑出钱办的报纸《民族日报》，当社长兼总编辑的王闻识同志也是共产党员。这家报纸成了浙西敌后有力的宣传武器。不仅这些舆论工具掌握在我们手里，全省政工队的领导权基本上也控制在我们手里。因此，当时人口不到五万的金华在抗日战争前期成为国统区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

一九四〇年初，我父母所住的地方——金华柴场巷挂出了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的牌子，我父亲担任了分社负责人，同时我们的住处还是“文化资料供应社”的所在地，不仅提供一些资料，还接待一些来往的文化人和去皖南找新四军的人。聂绀弩、骆宾基、杜麦青、辛劳、赖少其、林琼等同志都前后在我家住过。四〇年夏，在高尔基逝世四周年的那一天，我父亲在住处组织了一次小型的纪念活动，有十来个人参加，骆宾基、林淡秋恰巧要去新四军，路过这儿，也参加了。会上有人朗诵了高尔基的《海燕》，最后大家还一同唱了俄国革命歌曲《囚徒歌》。当时浙江是陈立夫、陈果夫的老巢，反动势力很猖獗，特务活动更是张牙舞爪，共产党完全处于秘密状态。当时金华地下党的工作属浙江金衢特委领导。我父亲对刊物方面工作管得很细，具体到每个刊物，每期有什么样的短论，都亲自布置。当时各报刊的党员编辑组成了文化支部，每次支部生活就在我们家里过，我父亲经常在支部会上讲形势任务，讲斗争策略。

一九三九年冬，冯雪峰同志从浙江义乌老家来到金华，与我父亲谈了整整一夜，原来冯雪峰同志是因为对白区工作的方针路线与博古发生严重分歧意见，一气之下，回老家写作的。他详细谈了事情的经过。第二天我父亲就离开金华，向东南局作了汇报，经东南局研究，同意恢复冯雪峰同志的组织关系；也就在这一次，东南局决定成立东南文委，并派我父亲担任了东南文委书

记，雪峰同志、骆耕漠同志任委员。

一九四〇年五至六月间，因金衢特委被破坏，组织命令我父亲立即撤离浙江。当时我母亲已经怀了我，北上有困难，决定南下福建，同行的还有杜麦青同志，他们三个分别化装成医生、司药、护士。福建是陈仪的管辖区，陈仪是和国民党“中央嫡系”有矛盾。因此福建情况与浙江有所不同，但这时浙赣路沿线已经被敌人封锁了，特务极多，其中有一个姓蒋的特务专门在火车上抓人。这个人是叛徒，他认识我父亲。当时形势已经很紧张了，浙江的国民党已经通缉要抓我父亲了，因此我父亲他们只好坐长途汽车，一段一段地走。沿途多次遭到特务搜查。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次搜查在江山，他们住在江山一家地下党员毛鹏仙（毛鹏仙在皖南事变后被送进上饶集中营，现不知下落）开设的小旅店里，半夜时分，小店突然闯进一个班的宪兵，翻箱倒笼，突然在我父亲箱子里搜出一本英文书，封面有列宁的大照片，这自然是犯禁的书，单凭这本书就可坐班房，于是宪兵头子象抓到什么把柄一样厉声责问：“这是什么人？”在场的杜麦青同志和我母亲都十分紧张。为了掩饰这种紧张，我母亲转身过去抓起一个桃子往嘴里送。而我父亲却毫不介意地望了望书皮，沉着地回答：“这个人你一定知道，是美国有名的诗人。”接着说了一个很长的英文名字，宪兵队长立即象认出了什么似的，装着恍然大悟的样子说：“知道，知道。”便放下了书。敌人是凶残的，毕竟又是十分愚蠢的。

历尽艰辛，到了福建浦城，在地下党员林涧青同志的接应下，四〇年夏末辗转到了永安，这是抗战时期福建省会所在地。我父亲立即给黎烈文写信。黎烈文曾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和《申报》的编辑、左翼作家。那时在福建任改进出版社社长，同时主编综合性半月刊《改进》，曾邀请我父亲去出版社工作。黎烈文一接信比较紧张，立即通知《现代文艺》主编王西彦。原来在我

父亲来福建之前，这里曾发生过一次风波。正是为了《现代文艺》创刊号上登了我父亲的一篇小说《英雄》，引起了福建国民党保安处处长的注意，以“妨碍役政”的罪名向陈仪告了一状，并指出改进出版社编辑部里潜伏有共产党，我父亲在这种情况下去改进出版社是有风险的，难怪黎烈文会如此紧张。我父母到达永安的当晚，先通知王西彦，他深夜又找到黎烈文，第二天一早，黎去向陈仪请示，陈阻止了省国民党保安处要逮捕我父亲的行动，又经过一番磋商，我父亲总算得到了《改进》出版社编辑的公开身份。而杜麦青同志不能被留下。这时我母亲就向出版社预支了她即将要在这里出版的小说集《生命》的稿费，做为麦青同志去安徽找新四军的路费。后来我母亲在出版社主编过一段时间《现代儿童》。

不久，福建省地下党省委便两次派人来找我父亲联系工作。当时父母并没有住在县城，而是在远离县城一个僻处荒郊，虎狼出没，瘟疫流行的小山村——蛤蟆村安了家。这个家住在一座孤孤单单的小木屋里，妈妈讲述：每天晚上要把敲击用的脸盆、照明用的火把全预备好，随时准备对付野兽的袭击。原来我们住的小木屋是农民堆柴的柴房，淹没在一片荒凉的茅草丛中，离祠堂还有三五十步远。就在这里，我父亲又着手了一些创作和翻译。《麒麟寨》（四幕剧）也是在改进出版社出版的。一切刚刚就绪，又传来一个新的消息，据说国民党中央保安处传令要逮捕“共产党重要分子邵荃麟、葛琴”。由于陈仪和国民党中央的某些人有内部摩擦，敌人并没有马上动手。也就在这多难的秋天，我出生了，出生在这动荡的战争岁月里，出生在这荒野的小柴屋里，条件十分恶劣。局势越来越恶化，蒋介石正准备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就在这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前夕，浙赣闽一带政治气氛是十分紧张的。十二月底，我父亲接到了桂林国新社发来的电报，要他去开年会，并电汇来二百元路费，后来才知道这是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